

历史

20世纪20年代苏联“本土化”政策的利弊分析

刘显忠

【内容提要】20世纪20年代,苏维埃政权为了赢得国内少数民族的支持,在少数民族地区推行“本土化”政策。“本土化”政策促进了少数民族文化、教育的发展,使各少数民族亲身感受到了苏维埃政权对他们的尊重,也增强了他们对当局的信任,巩固了苏维埃政权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地位。但“本土化”政策也导致了地方民族主义以及对民族地区非本土民族(包括俄罗斯人)利益的损害或忽视等问题。

【关键词】苏联 民族政策 “本土化”

【中图分类号】K512.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1094(2013)01-0079-0006

“本土化”政策,是20世纪20年代苏维埃政权在民族地区推行的以当地少数民族语言取代俄语、吸收原住民族参与地方管理的政策,目的是纠正沙皇俄国推行的强制俄罗斯化政策,以增强少数民族对苏维埃政权的信任,通过吸收当地居民参与地方管理的方式巩固民族地区的苏维埃政权。其基本思想是斯大林在1923年春天举行的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斯大林提出:“为了使苏维埃政权成为对其他民族的农民同样亲近的政权,就必须使苏维埃政权成为其他民族的农民所了解的政权,它必须使用本族语言办事,学校和政权机关必须由熟悉非俄罗斯民族的语言、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的本地人组成。只有当这些共和国的政权机关用本族语言说话和工作的时侯,苏维埃政权(直到最近还是俄罗斯的政权)才不仅能够成为俄罗斯的政

权,而且能够成为各民族的政权,成为过去被压迫民族的农民所亲近的政权。”^①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明确规定:“各民族共和国和各民族区域的机关主要应由熟悉各民族语言、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的当地人组成。颁布特别法令,在为当地非俄罗斯民族居民和少数民族服务的一切国家机关和一切机构内,保证使用本民族语言;颁布法律,对一切侵犯民族权利,特别是少数民族权利的人,用最严厉的革命手段予以追究和惩治。”^②俄共(布)十二大正式宣布“本土化”为布尔什维克党在民族问题上的主要方针。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斯大林论民族问题》,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第231页。

^②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二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89页。

【作者简介】刘显忠,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从苏联到俄罗斯:民族区域自治问题研究》(项目编号:11BMZ037)阶段性成果。

一、“本土化”政策的积极成果

十二大之后，俄共（布）开始贯彻落实“本土化”政策。布尔什维克党当时所推行的“本土化”政策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使党和国家的机关干部“本土化”。十月革命以前，沙皇政府通过向民族地区的管理机关和行政机关安插俄罗斯人的方式对民族地区进行管理，推行强制俄罗斯化政策。布尔什维克党掌权后，积极吸收当地民族居民参加党政机关的工作，提高本土居民代表在各共和国机关中的比重。20世纪20年代实行“本土化”之后，少数民族成员在共产党员中间、在各个共和国党政机关中的比重都有明显上升。1922—1927年，共产党员中俄罗斯族人的比重从72%降到65%^①。在乌克兰，1920年年末乌克兰族人约占乌克兰总人口的80%。1922年4月，乌克兰共产党（布）中乌克兰族人占23.3%，俄罗斯族人和犹太人的比重分别为53.6%和13.6%^②。当时乌克兰族人在乌克兰政府机关中的比重不超过35%^③。从1922年到1932年，乌克兰族人和白俄罗斯族人在他们各自共和国党组织中的比重分别从24%和21%增至59%和60%。1932年在中亚各民族共和国，本民族成员也已经占共产党员总数的一半以上^④。1924年，乌克兰族人在乌克兰的中央和省级机关中占39.9%；在外高加索，当地民族代表在中央及省级机关中占54.3%，其中：格鲁吉亚人占29%以上，亚美尼亚人占22.5%，操突厥语的民族（阿塞拜疆的基本居民——作者注）占1.5%；在土库曼斯坦，共和国级别机关中土库曼族人占10%；在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级别机关中哈萨克族人占8.3%。1925年，在白俄罗斯的中央机关中有42.6%的工作人员是白俄罗斯族，在巴什基尔中央执行委员会巴什基尔族人占50.5%，在雅库特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中雅库特人占16%。到1930年前夕，“本土”民族在各自共和国级的机关中所占比例如下：在白俄罗斯占59.4%，乌克兰36.2%，外高加索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29.94%，哈萨克斯坦12.7%，鞑靼斯坦33.8%，阿塞拜疆36.79%，亚美尼亚93.53%，格鲁吉亚74.6%^⑤。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中亚实行了“本土化”，但由于当地民族中有文化的干部不足，致使当地民族的人在国家管理机关中仍处于少数，而俄罗斯族人在其中占多数的状况没有多大改变。

另一方面就是大量建立民族语学校，推广使用民族语言。在沙皇俄国时期，政府推行强制俄罗斯

化政策，境内很多少数民族在语言、文化、教育方面都受到诸多限制。就乌克兰族人来讲，1906年俄国教育部同意把乌克兰语作为辅助语言以“解释学生不理解的内容”，但1907年这一决定又被收回。1908年俄国政府拒绝了一些杜马代表提交的关于乌克兰族人的初等教育使用母语的法案。1911年俄国大臣委员会还强调，由于小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的旧称）和白俄罗斯族人不能列为异族人，他们的教育“应当用俄语进行”。1914年2月俄国内务部还反对纪念著名的乌克兰诗人Т.Г. 舍甫琴柯诞辰100周年。对犹太人的文化限制更为严格，1908年8月俄国大臣委员会严格规定了犹太人进入高等学校的百分比：在各个首府为3%，在犹太人定居区以外的其他城市为5%，在犹太人定居区是10%^⑥。

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不仅废除了沙俄时期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化发展的限制，而且还在各地普遍建立了民族语学校，推广、普及少数民族语言，使少数民族学生都享受到了母语教育，满足了其境内各少数民族多年来一直争取但始终没能实现的要求。20世纪20年代，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小学共使用68种语言进行教学。比如，巴什基尔的小学用巴什基尔语、俄语、鞑靼语、乌克兰语、楚瓦什语、马里语教学；鞑靼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的小学用鞑靼语、俄语、楚瓦什语、马里语、乌德穆尔特语、莫尔多瓦语、乌克兰语、德语教学；克里木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的小学用俄语、鞑靼语、乌克兰语、德语、犹太语、希腊语、亚美尼亚语、保加利亚语、爱沙尼亚语、捷克语、波兰语、意大利语教学；达吉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小学用阿瓦尔语、俄语、拉克语、列兹根语、奥塞梯语、切尔克斯语、达尔金语、亚美尼亚语、库梅克语、德语教学。当时不仅在民族地区建立了民族语学校，而且在俄罗斯族人（聚居或为主要居民）

① Каппелер А. Россия-много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империя: возникновение, история, распад. Москва, 2000, С.275.

② Лановик Б. Д., Лазарович М. В. Історія України. Київ, 2006, С.371.

③ Політика українізації. http://revolution.allbest.ru/languages/00001301_0.html

④ Каппелер А. Россия-много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империя: возникновение, история, распад. С.275.

⑤ Хмара Н. И. Из опыта 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а в СССР (1920-е-1930-е годы) //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2006, №3. 按：在乌克兰出版的教学参考资料中，1923—1927年间，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乌克兰人的数量从35%上升到54%。См.: Лановик Б. Д., Лазарович М. В. Історія України., С.374.

⑥ Дякин В. С.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вопрос во внутренней политике царизма (начало XX) //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996, №11-12.

的地区也有类似的学校：在列宁格勒州有用俄语、芬兰语、爱沙尼亚语、波兰语、拉脱维亚语、犹太语、鞑靼语、乌克兰语、德语和涅涅茨语进行教学的不同小学；在莫斯科州有用俄语、乌克兰语、拉脱维亚语、鞑靼语、犹太语、德语、莫尔多瓦语、卡累利阿语、茨冈语进行教学的不同小学；在中央黑土州有用俄语、乌克兰语、德语、鞑靼语、犹太语进行教学的学校；在伊万诺沃州有用俄语、白俄罗斯语、鞑靼语进行教学的学校^①。当时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甚至允许突厥斯坦的地方当局开办教会学校，还把由父母付酬请专门教师于课余时间到苏维埃学校的教室里传授教义作为一项临时措施^②。到1927年，有90%的白俄罗斯族学生、94%的吉尔吉斯族学生和几乎96%的鞑靼族学生在各自的共和国使用母语教学的小学学习。当时也为那些没有自己共和国的民族建立了这样的学校：在乌克兰，有一半的犹太人都在犹太语学校接受教育^③。1923年苏联有411所波兰语学校，其中教师685名，学生16086名。1924年8月还提出建立白俄罗斯族天主教徒和乌克兰族天主教徒的波兰语学校问题。1925年9月17日政治局根据边界地区委员会的报告提出了“扩大民族学校网”问题^④。

当时，除了大量建立民族语学校普及民族语言之外，苏联政府还要求在公文处理、教育、报刊出版等领域使用民族语言。例如，在外高加索，1925年大部分中央机关都用当地语言处理公文；在白俄罗斯，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公文都是用白俄罗斯语写成的；在乌克兰各个省和民族区的机关，公文都使用乌克兰语。1922年乌克兰只有20%的公文采用乌克兰语，1927年这一指标达到了70%^⑤。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在乌克兰工业区改用乌克兰语的进程比较缓慢。但乌克兰语最终还是成了乌克兰的主要交流语言，在官方公文和教育、报刊出版等领域被广泛使用。1929年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80%的中小学、60%以上的中等技术学校及30%的高等专科院校用乌克兰语教学。乌克兰语的报刊和出版社的数量在扩大：一半以上的书籍、报纸和杂志都开始用乌克兰语出版。到1930年前夕，乌克兰语学校和俄语学校的比例是10:1，2/3的中等技术学校和1/3的高校都用乌克兰语进行教学^⑥。

这一时期，苏联政府还为无文字的语言创造文字做了大量工作。到20世纪30年代末，46个无文字的民族有了自己的文字。

这些措施的目的不仅是要发展民族文化和语言，

而且也是要在其基础上普及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本土化”政策促进了少数民族文化、教育的发展，使各少数民族亲身感受到了苏维埃政权对他们的尊重，也增强了他们对当局的信任，巩固了苏维埃政权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地位。对布尔什维克党这一时期的民族政策，即使是一些西方学者及苏联持不同政见者也给予了高度评价。一位德国历史学家就曾称20年代为苏联各少数民族的“黄金时代”^⑦。乌克兰持不同政见者伊凡·麦斯特连柯也指出：“这些年代里出现了所有加盟共和国的民族文化和国家建设的空前的繁荣以及自治共和国和自治州的民族复兴。民族共和国和州的中小学改用当地居民的本族语言教学，虽然到三十年代初取消民族区域自治前并不是每所大学都改用本地语言教学，但还是有部分加盟共和国高等院校加入了这一行列。几乎所有加盟共和国的报刊和图书出版社也都改用本地民族文字出版。人们认为，供俄罗斯居民阅读的俄文报刊和书籍可由莫斯科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其他中心供应。绝大多数剧院也改用本地语言演出。在两个斯拉夫共和国（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由于本地语言和俄语相近，俄罗斯居民特别是工人和小职员，把自己的子女大批送进民族学校，认为这样更有前途。在某些县城和省城，人们在街上都讲起了本族语言，而革命前，本族语言被更‘文明的’俄语所排挤。总之，民族区域自治如能再继续十年，非俄罗斯共和国和州的民族问题就会完全解决从而更加有利于当地居民。”^⑧

二、“本土化”政策的负面效应

在肯定“本土化”政策的同时也应看到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党的民族政策并没有一劳永逸地解决民族问题，相反在推行“本土化”政策的过程中，也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

① Бурмистрова Т.Ю. Зерна и плевелы: 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политика в СССР(1917-1984).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1993, С.41-42.

② Там же, С.47.

③ Каппелер А. Россия-много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империя: возникновение, история, распад. С.276.

④ Костюшко И.И. Польское национальное меньшинство в СССР(1920-е годы). Москва, 2001.С.121.

⑤ Лановик Б. Д., Лазарович М.В. Історія України.С.374.

⑥ Политика украинизации.

⑦ Каппелер А. Россия-много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империя: возникновение, история, распад. С.274.

⑧ [苏]伊凡·麦斯特连柯：《苏共各个时期的民族政策》，林钢译，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04页。

第一，“本土化”政策的实施导致对非本土民族（包括俄罗斯人）利益的损害或忽视。奥尔忠尼启则在1923年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提到了各个共和国忽视非本土民族的事实：根据1923年的资料，当时在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中，没有一位人民委员出身俄罗斯民族或亚美尼亚民族，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的情况也是如此。在梯弗里斯（1936年改称第比利斯），第二届梯弗里斯苏维埃的成员中格鲁吉亚族人占43%（尽管他们在格鲁吉亚首都居民总人口中仅占25%），亚美尼亚族人占17%（在总人口中占1/3以上）^①。在一些民族地区俄罗斯族人成了新的“少数民族”，其利益也受到了损害。1923年8月一份提交给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分析报告就指出：“在苏联的很多构成体中，俄罗斯族居民的利益都受到了损害，而原住居民获益。”^②戈尔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的俄罗斯族居民代表在一份呼吁书中说：“俄罗斯族居民的生活状况令人难以忍受，正在普遍走向破产，被迫搬出戈尔共和国……对俄罗斯族人经常不断的掠夺和采取的强制措施完全破坏了民族地区的经济。”^③有些卡尔梅克的俄罗斯族人当时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应当赋予我们与卡尔梅克人同样的权利。”^④忽视俄罗斯族人利益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除俄罗斯联邦外其他加盟共和国都有自己的党组织。在1925年12月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俄共（布）改称联共（布）后，因党的名称的改变在党的高层出现了建立俄罗斯共产党问题的讨论。当时奥尔忠尼启则提出组建俄罗斯共产党的建议，加里宁表示支持，伏罗希洛夫也认为在按国家的名称更改党的名称的情况下，“从逻辑上讲必须组建俄罗斯共产党，因为在苏联有俄罗斯联邦”。但斯大林反对这一要求，认为建立特殊的俄罗斯共产党是非常危险的，“有可能导致党以联邦制的形式分裂”^⑤。

第二，“本土化”政策导致民族主义情绪的滋生，而中央纠正“本土化”政策偏颇时，又采取了非正常的过激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为民族清洗提供了借口。如1928年年初，在亚美尼亚揭露了所谓的“独特性主张者”集团，他们被指控过分强调各共和国的民族独特性。乌兹别克斯坦、突厥斯坦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霍贾耶夫（У.Ходжаев）、黑德拉里耶夫（Хыдыралиев）等被指控为“民族右倾主义”，他们被指控包庇巴依（中亚、新疆的富牧主、富地主）、原沙皇政府官员和那些推行民族主

义路线及反对中央派来的干部的人。在哈萨克斯坦，1926年尖锐地批判了共和国的工作人员萨德沃卡索夫（С.Садвокасов）、哈贾诺夫（С.Хаджанов）、蒙巴耶夫（Ж.Мунбаев）的“民族倾向主义”集团支持阿乌尔（高加索、中亚等地的乡村）的剥削分子，阻挠工业发展，力图使哈萨克斯坦与其他共和国分开等。1926年共和国著名的活动家雷斯库洛夫（Т.Рыскулов）被控犯有民族主义性质的错误。鞑靼布尔什维克的杰出代表、民族人民委员部委员会成员苏丹—加利耶夫（М.-Х. Султан-Галиев）于1923年被开除党籍，而后在鞑靼对“苏丹—加利耶夫分子”进行了长时间的搜寻（苏丹—加利耶夫本人在1940年被枪决）。在没有充分根据的情况下对民族主义者进行的镇压使各民族蒙受了巨大损失。对这种结果，苏丹—加利耶夫实际上已经预料到了，他在一次会议上曾指出，大国沙文主义者“……将会以巴什基尔民族主义为借口，打击巴什基尔共产党人……同地方民族主义的斗争有可能采取不正常的形式”^⑥。

第三，“本土化”政策主要是要消除沙俄时期推行的违背少数民族意愿的强制俄罗斯化的影响，但在推行过程中有些地方同样表现出不顾实际情况以及违反少数民族意愿的行政命令式的强制性特点。在白俄罗斯苏维埃选举时，同俄罗斯交界地区的几个村的居民出于现实的考虑，做出了“在学校不实行白俄罗斯化”的决议，附在了给代表的委托书后面，但未被接受。1927年斯摩棱斯克州有些犹太村的苏维埃主席反对把公文翻译成犹太语，认为这办不到^⑦。在乌克兰，时任乌共中央第一书记的埃曼努伊尔·克维林（Эммануил Квиринг）曾做出在1926年1月1日前结束国家机关和企业乌克兰化的决议，结果，他本人于1925年4月被免职，由拉扎尔·卡冈诺维奇（Лазарь Каганович）取而代之。卡冈诺维奇任命原乌克兰社会革命党人亚历山大·舒姆斯基（А.Шумский）为乌克兰教育人民委员，

① Хмара Н.И. Из опыта 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а в СССР(1920-е-1930-е годы).

② Там же.

③ Там же.

④ Там же.

⑤ Вдовин А.И. 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политика 30-х годов(Об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корнях кризиса межнациональных отношения в СССР)// Вестник Москов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Серия.8. История.1992, №4.

⑥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вопрос на перекрестке мнений.20-е годы.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92, С.200.

⑦ Хмара Н.И. Из опыта 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а в СССР(1920-е-1930-е годы).

狂热地推行苏共中央和政府的决议,开始了全面乌克兰化进程。敖德萨的乌克兰族学生不到1/3,但所有的学校也都“乌克兰化”。“乌克兰化”政策在当地的乌克兰民众中并没有得到支持。不仅在学校和其他学术机构,而且在机关和日常生活中乌克兰语都是以强制的革命方式和“斯达汉诺夫”的速度推行的。有几年在基辅曾禁止所有的俄语出版物出版,而一些不太懂乌克兰语的年老职员,甚至一些流利地掌握乌克兰语口语的乌克兰族人都被残酷无情地从各个机关中赶了出来。乌克兰“意识”成了担任各种职位的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标准。当时各个机关和企业的职员,包括清洁工和管院子的人都要“乌克兰化”。不想“乌克兰化”或乌克兰语考试没通过的人要被免职,无权领取失业补助金,并被配发黑籍证(沙皇俄国时期发给革命者的证件——作者注)^①。

三、结论

苏联20世纪20年代推行的“本土化”政策意在纠正沙俄推行的“俄罗斯化”政策,但矫枉过正,同样也带来了许多不利影响,甚至为70年后苏联解体埋下了伏笔。苏联解体后曾担任乌克兰总统的Л.库奇马的一段话可资佐证:“卡冈诺维奇不懂乌克兰语,但以突击的方式学会了乌克兰语,这给全体工作人员树立了榜样。他大量吸收乌克兰人入党,

把苏维埃工作人员中乌克兰人的比重提高了50%,很快,共和国的大部分书籍、杂志和报纸都用乌克兰语出版。一些著名的文化和艺术学者、作家信任共产党人,从国外返回乌克兰。乌克兰语在一些指挥员学校和红军的一些部门里推行。截至1927年,乌克兰大部分中等专业学校和1/4以上的高等专科学校都改用乌克兰语教学,这只是开始。1930年,使用乌克兰语教学的学校的比重达到85%。无论对20世纪20年代发生的情况持何态度,应当承认,如果不是当时实行学校的‘乌克兰化’,也许就不会有我们今天的独立。大众化的乌克兰学校,培养了千百万乌克兰人,正如时代所表明的,大众化的乌克兰学校成了乌克兰因素中最重要和最无法破坏的要素。”^②实践表明,苏共的民族政策是不成功的,苏联并没有找到如何巩固和发展多民族国家,保障各民族和谐共处、共同繁荣之路,从苏联“本土化”实践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民族政策上不能走极端,不能迷信行政力量,应该尊重人民自己的选择;在一个统一的国家内,不能按民族成分确定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培养公民平等意识是十分重要的。苏联的教训值得研究和总结。

(责任编辑 刘阳)

① Политика украинизации.

② Кучма Л.Д. Украина--не Россия. Москва, 2003, С.19. см.: Медведев Р. Расколота Украина. Москва, 2007, С.100.

An Analysis of the Pros and Cons of the Localization Policy of the Soviet Union in the 1920's

LIU Xianzhong

Abstract: In the 1920's, the Soviet regime implemented a localization policy in the ethnic regions in order to win support from them. The localization policy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e and education of the minorities, made the minorities feel that they were highly regarded by the Soviet regime, boosted their trust in the authorities and consolidated the position of the regime in the ethnic regions. But the localization policy also lead to a local nationalism and jeopardized or ignored the interests of the none-natives in the ethnic regions.

Key words: Soviet Union; ethnic policy; localization

Плюсы и минусы политики “коренизации” СССР в 1920-е годы

Лю Сяньчжун

【Аннотация】 В 20-е годы XX века в СССР главной линией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и стала политика “коренизации”. Данная политика была направлена на содействие развитию культур и просвещения бывших угнетенных народов, она должна была показать, что партия уважает традиции и права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ей этнических групп, входящих в состав Союза, а также укрепить большевистскую власть на местах. Однако эта политика вызвала появление децентрализаторских тенденций, усиление местного национализма, дискриминации “неместного” населения (в том числе и русских) на территориях республик.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СССР; 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политика; “коренизация”

订 阅 启 事

2013年《俄罗斯中亚东欧市场》

大 16 开 月刊 邮发代号 2—475 每期定价 14 元 全年订价 168 元

《俄罗斯中亚东欧市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主办的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国际经济类刊物。

《俄罗斯中亚东欧市场》的主要栏目有：“要文特约”、“俄罗斯”、“中亚五国”、“中东欧”、“经济合作”、“法律法规”、“市场调查”、“商务指南”、“政策导航”、“边贸论坛”、“欧亚博览”和“经贸信息”等。

该刊既面向从事经济理论研究的专家学者，又面向广大企业和经济管理工作。积极反映俄罗斯、中亚、东欧国家市场经济研究的最新成果，突出信息性和可读性，积极跟踪和评析经贸热点、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动态等，努力把高层次的基础理论与可操作性的应用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受到广大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的好评。该刊被列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计量与科学评价研究中心编制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贸易经济专业核心期刊。

2013年《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

大 16 开 双月刊 邮发代号 2—474 每期定价 18 元 全年订价 108 元

《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主办的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国家级学术理论刊物。该刊坚持高品位、高学术性，以反映俄罗斯、中亚、东欧国家政治、经济、外交、理论、历史、文化、军事和民族等各个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为主要任务。自 1981 年创刊以来，该刊以其独特的风格——综合性、战略性、学术性、理论性、政治性和现实性赢得了国内外广大读者的信任，受到广大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的好评，被收录到《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和《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中。1999 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首届优秀期刊奖，2002 年、2005 年和 2008 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二届、第三届和第四届优秀期刊评奖活动中获一等奖，2005 年获国家百种重点期刊奖。